

第一章 编辑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1]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以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体。这种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毛泽东称之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人类社会生产的角度，其内容应是指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当我们集中研究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的时候就会发现，编辑活动自始至终参与其中。但是，在以往的历史中，编辑却没有被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文化活动而被重视和研究。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编辑史和‘编辑无学’的认识误区

一、人类社会的编辑活动历史悠久

人类社会的编辑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研究和考证，有学者认为，编辑活动产生于人类用文字记录信息、知识之后。随着文字资料的增多，为了收藏积累“藏诸名山，传与其人”，就需要有人对这些资料进行收集、整理、选择和加工。使用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刻制的泥版文献，古埃及的纸草文书，古印度的贝叶经书以及中国夏商时期将文字刻在竹木、甲骨上而形成的“典”“册”这些文献典籍的形成，已有编辑活动在其中萌生。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以汉字文化为主线而不断融合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自古以来崇文重著，靠汉字记载、传承的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承。图书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数千年前产生的中华元典《书经》到记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史的《清史稿》、《清实录》，中国的文字记载从没有中断过。在形成这些文献典籍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编次”、“编著”、“编辑”、“编订”、“编集”、“编修”、“编撰”、“编纂”、“纂辑”等含有古代编辑活动特点的词汇。从远古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到今天的电子音像制品的编辑，随着媒体材料和复制技术的进步，各种著述异彩纷呈，各种著作体裁的创立繁富多样。作为设计组织、选择加工这些著述的编辑活动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积累了许多理论性、规律性的知识。从孔子修《诗》、《书》到今天，历代编辑活动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历代编辑家在实践中形成的编辑思想、编辑方法，开创的编辑体例，都为今天的编辑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研究这些成果，对于今天编辑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二、“编辑”的学问何以长期没有被重视

与编辑活动悠久的历史不相称的是，“编辑”的学问长期没有被重视和很好地研究，甚至被认为“编辑无学”。原因何在？归纳研究者散见于各处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传播事业发展规模的限制，影响了人们对编辑活动的了解和认识。首先，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以书籍传承的文化一直由统治阶级控制，成书的目的主要是资政、教化，从事编辑活动的人一般是政府官员和文人学者，许多书籍的编撰往往是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这种文化垄断的结果大大限制了文化的传播。书籍编辑活动所具有的浓厚的权力色彩淡化了其文化活动的含义，资政、教化的功利目的限制了编辑成果作为文化成果向社会广泛传播，只能藏在秘府，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编辑成果的这种地位根本不可能使编辑活动有显性的位置。其次，媒体材料和复制技术也直接制约编辑活动的规模和效果。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由甲骨、金石、竹帛发展为纸张，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简策大约出现在夏代，^[2]造纸新技术改进推广于东汉后期（105 年），但直到东晋末年（404 年）才由政府下令以纸代简，此后书写材料才逐渐以纸为主。清人阮元说：“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图书复制技术经历了手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几个阶段。雕版印刷术“肇自隋时，行于唐世”，^[3]但唐代仍是写本书时代，真正使用这一技术印书的是宋人，宋代是雕版印刷的兴盛时期。北宋时期（1041 ~ 1048 年）劳动人民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人王祿改进了木活字（1298 年），1403 年朝鲜人创制铜活字，直到 1455 年德国人 J. 谷登堡创制出铅合金活字，才完成了现在我们通常称作铅字的活字印刷新技术。公元纪年前后至 2 世纪初中国人发明、改进了造纸技术，15 世纪中叶德国人发明了印刷机械，直到这时，机械复制技术才使最佳的文字载体纸和先进的活字排版印刷技术配套起来，使出版物的大量复制成为现实，这中间经历了十三个世纪的时间。活字排版、机械印刷的复制技术，直到 20 世纪仍在广泛使用。

媒体材料、复制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媒体材料、复制技术的发展水平标志着出版生产力的水平。中国古代出版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编辑者与著述者、出版者、印刷复制者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即编辑活动没有成长发育为独立的文化活动。编辑活动的这种社会文化地位决定了编辑学问的地位。正如王振铎所说：“人类在社会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中，虽然已有几千年的编辑活动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但是由于旧时代的编辑工作，社会化程度甚低，不论是古代政治性的宫廷编辑，还是近代商业性的私人编辑，都没有自觉地把编辑视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缔构活动、文化传播活动和文化再生产活动。”^[4]因此，古人关于编辑活动的思想见解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只散见于书籍的序跋和校勘、目录、编撰诸学之中。

二是编辑活动及其成果的隐蔽性特点，使人们对编辑活动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的关系极为密切。叶向荣认为著述活动与编辑活动是“属”与“种”的关系。著述活动中有原创性著述活动和再创造性著述活动，编辑与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为同一序列，属再创造性著述活动，其作用的对象是原创作品（或现成作品）而不是“材料”“资料”。^[5]实际上，给编辑活动的这种定性与定位并未准确反映其特点与内涵。有研究者不赞同把编辑创造称为再创造，认为编辑的创造有许多是原创性的。例如在当代编辑活动中，选题的设计与策划越来越占重要位置。设计与策划选题属原创性活动。选题是编辑出版活动的第一环节，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选题决策是出版部门最基本最重要的决策。^[6]在选题的原创性活动中，被思维“加工”的对象是各种信息、资料及材料。其实，古代的编辑活动选题也是第一的重要的环节。梁朝萧统和他周围的文人编辑的《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的编辑体现了编辑者对文学作品的见解，其选择标准是开创性的。不仅选题需要创造性，组稿、审稿、加工、装帧、设计（美术编辑）等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创造性。经过编辑过程最终进入传播领域的出版物，凝聚了编者创造性的智慧和心血，一切出版物，都是作者和编者共同创造的成果。但是编辑活动的创造与著述活动的创造不同，作者的创造是显性的，成果是独立的，而编者的创造却不易被外人所了解。因为编者的劳动及创造都融在了作者的作品之中，是以作者的创造形式出现的，外界所看到的只是署有作者姓名的作品，并不了解这部作品最终成为见到的这个样子，编者在其中付出了哪些劳动与创造。编辑劳动及其成果的这种隐蔽性和不独立性特点，影响了人们对编辑活动的深刻了解和认识，在漫长的编辑活动史中，编辑的学问迟迟没有成为显学，这也是重要原因。时至今日，编辑从业人员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学与识，不仅业外人不够了解，就是在业内，也不是人人都十分清楚的。

第二节 20世纪编辑学在中国诞生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编辑学

“编辑学”名词的首次提出是1949年3月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编辑学》。作者是广东国民大学新闻教授李次民。全书22章，20万字，主要讲报纸编辑，有专章论杂志。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提出“编辑学”的著作。195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К.И. 倍林斯基的授课讲稿“书刊编辑课大纲”，但在成书时定名为《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这本书虽然涉及了刊物的编辑，但主要是讲书籍的编辑工作。1965年香港海天书楼出版了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作者是一位资深编辑。该书几次再版，主要在东南亚地区发行，内容侧重讲述杂志的编辑实务。1979年10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闻编辑学》，作者荆人是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该书以报纸编辑为主，侧重介绍新闻编辑实务。

20世纪80年代以前，“编辑学”这个词汇虽已出现，但并没引起人们多大注意。虽然出

现了几部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但从总体上来说,人们对“编辑”的学问还缺乏认识,编辑学的研究还没进入自觉的时期。

编辑学研究的自觉时期,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

二、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的创生时期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编辑学的酝酿萌生阶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业相配套的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形势和任务向负有思想文化传播使命的编辑出版行业提出了急切而高标准的要求:迅速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局面,为改革开放大业和思想解放运动提供理论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满足人们压抑已久的无比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

1.面对形势和任务,党和政府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当务之急是拥有一批讲政治、业务素质强的编辑,把握好编辑出版的导向。这些都充分体现在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党和国家就出版工作做决定,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决定》实际上是开展编辑学研究的总动员令。

2.党的资深理论家、著名科学家、编辑出版界的领导者及有识之士,是编辑学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促进者。

1979年2~3月,在国家出版局于北京连续召开的编辑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一些编辑出版工作者提出“要通过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写出《编辑学》、《出版学》”,以“提高编辑工作质量,促进出版事业繁荣”。^[7]1979年12月,老一辈出版家、出版工作领导者胡愈之在给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的贺词中说:“出版工作者同新闻工作者一样,是一种专业”,“在大学里应该有出版专业。”^[8]1980年4月和1982年4月,由当时国家出版局主办的《出版工作》上刊载了呼吁研究编辑学的文章。1982年11月,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的王子野在为钱小柏、雷群明编著的《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1983年)所作的序中说:“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唯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有的位置。”1983年,党的资深理论家、宣传家胡乔木于3月、6月和7月在给出版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谈话及写的信中,连续三次发出指示:“编辑是编辑,出版是出版,出版离不了编辑,但编辑是独立学问。”^[8]“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不好即能胜任。”要在大学设立编辑专业,要

研究编辑学。^[9]同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国防工业出版社的一次讲话中强调:“编辑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它的规律,“创造出一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编辑科学”。^[4]著名科学家裴丽生也是编辑学研究的早期倡导者和支持者。

3.编辑出版界的一些资深编辑家是编辑学研究的积极推动者和身体力行的先驱者。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资深编辑如陈仲雍、倪子明、肖月生等在报刊上发表了《科学地编辑与编辑的科学》、《需要一部编辑学》等文章,提出“数万名编辑人员”很需要一套切合实际的编辑学。研究编辑学已是“当务之急”。并提出了要建立图书编辑学、报纸编辑学、杂志编辑学,认为“百科全书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儿童读物编辑学……有共性又有个性,彼此都有不同的特点”。^[10]北京出版社首先收集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了由茅盾题写书名的《编辑杂谈》(1981年第一集,1983年第二集,1985年第三集,1987年第四集),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有关研究者探讨编辑工作方法与规律的热情与执著。1982年6月,郑兴东的《报纸编辑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新时期我国大陆第一部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书中对报纸的编辑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作者从新闻学的角度视之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对书刊编辑学的研究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3年11月,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宋原放向中国版协于广西召开的首届年会提交了《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论文。文章对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该文发表于《出版工作》1984年第1期。宋原放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倡导和设想得到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响应,此后,不少出版专业刊物先后展开了有关建立出版学、编辑学的讨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渐趋深化。1983~1984年出版的《科技编辑工作概论》(罗见龙、王耀先著,科学出版社,1984年)、《编辑忆旧》(赵家璧著,三联书店,1984年)以及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编辑丛书”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对编辑工作规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国编辑工作由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编辑学的创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令人信服的依据。

4.在我国,编辑学和出版学的研究是同时提出、同步发展的。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在酝酿倡导阶段,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深入探讨编辑学与出版学的联系和区别。可以这样说,在初创时期,无论是以编辑学为号召还是以出版学为号召,对于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学科创立与建设都同样起到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只是在后来的具体研究中,有的侧重于探讨编辑学的概念和学科体系,有的侧重于研究出版学的概念和学科体系,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编辑学的开创阶段

提出研究编辑学的初期,曾出现过编辑究竟有学还是无学的争论。“编辑无学”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编辑属“述而不作”,编辑只是一种程式化的操作过程,编辑是一种技能或技术,而不是学问。当编辑需要学问,但那不是编辑本身的学问,而是编辑以外的学问。因

此 研究者们认为 研究编辑学 就是要将“编辑”本身的学问研究出来。为了开垦“编辑学”这方蛮荒之地，编辑学研究的先驱们筚路蓝缕，锲而不舍，为编辑学的确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成立了学术组织；形成了研究阵地；研究出一批成果。

1.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研究编辑出版科学为基本任务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成立。

1985 年 3 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首先在北京成立；6 月，上海编辑学会成立。随后，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以及省级有关编辑出版的学术团体先后成立。这些学术组织的成立，使编辑学研究从零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走向了群体合力的科学研究，为编辑学研究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这些学术团体通过组织编辑学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编辑学文集，策划撰写出版编辑学论著等活动方式，为编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2. 以推动编辑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刊物的创办，使编辑学研究有了自己的阵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全国没有公开发行的有关编辑出版的专业刊物，追溯到解放前，出版类专业刊物也是凤毛麟角。进入 80 年代中期 冠以“编辑”“出版”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数量大增。其中以“编辑”为名的《编辑之友》（山西人民出版社创办 原名《编创之友》，1985 年改为现名并公开发行）《编辑学刊》（上海市编辑学会 1986 年创办）《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 1989 年创办 形成了“三刊”格局 成为反映编辑学研究进程最敏锐、最前沿的阵地 成为编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冠以“出版”的期刊则有《中国出版》（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前身《出版工作》，1991 年改为现名）《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 原名《出版与发行》，1988 年改为现名）《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 1982 年创办）以及浙江、河北、福建、广西、湖北、山东、上海等地的出版类期刊。这些刊物以大出版为目标，涵盖面比较广，但它们还是拨出了相当版面刊发编辑业务和编辑理论的研究成果。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益阳师专学报》、《大学出版》等学术期刊先后开设了编辑学研究专栏，《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 1990 年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也都为编辑学研究开辟了园地。此外，还有一些以读书或书评为主的刊物，偶尔也发一些有关编辑研究的文章。有些文学报刊如《漓江》、《文学报》也常刊发有关编辑研究的文章。仅从以上远非完全的名单就可以看出，编辑学的研究阵地已是今非昔比。可以说，这些期刊为编辑学的建立做了物质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一是大量的编辑活动实践经验的总结，为编辑学的建立提供了素材和资料；二是大量的理论探讨文章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为编辑学及其分支学科打下了基础；三是大出版的视野打破了编辑就是剪刀加浆糊、修修补补的文字工作的狭隘眼界，将编辑研究扩大到了选题策划、作者读者工作以及市场营销等广阔空间。与这个时期出版的编辑学研究专著相比，期刊更具有前沿性、尖锐性和时效性，便于研究者及时交流、讨论和争鸣。

3.研究成果以专著形式出版。

这个阶段，以专著形式出版的研究成果近四十种。其中，以多种出版物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研究论著近十种，研究书籍、期刊、报纸编辑活动的著作各有四五种，论文集有三四种。同时，研究编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的专著在这个阶段也已出现 例如《编辑出版学概论》、《编辑社会学》、《编辑写作学》、《新学科与编辑学》等。研究编辑史的专著有三种，编辑出版方面的工具书也出版了三四种。邵益文先生作为编辑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十分关注编辑学研究的进程。对每一阶段出现的编辑学论著，他都如数家珍，逐一点评。在他开列的书单中，1986~1991 年出版的冠以“编辑学”的论著为十九种。这些专著的出版，对编辑学的学科建设起了开路和奠基的作用。许多研究已不限于编辑过程、编辑工艺，也不限于编辑学的性质和任务，更多的是从基本范畴、知识体系和客观规律等方面下工夫探索。尤其是书刊编辑学的研究，其理论体系孕育其中，已见端倪。这些研究成果使编辑学的初步形象已活生生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例如 由阚道隆主编二十多位学界业界专家共同撰写的《实用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6 年)是我国第一本研究书刊编辑学的专著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开展编辑学研究最早取得的成果。该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孕育了我国最早的图书编辑学理论体系。1987 年 10 月出版的《编辑学论集——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中有该书主编阚道隆先生的一篇文章：《图书编辑学的研究内容》。文章将编辑学要研究的内容概括为编辑活动的性质、过程、主体、外部联系、组织管理和发展趋势六个方面。这一认识是他主编《实用编辑学》的实际体会，当然源于对书籍编辑活动的认知与体察。该书的开创性工作成为此后编辑学著作的重要范式。该书的另一特色就是“实用”，书中讲述了几种图书和一种刊物的编辑工作。因为该书的作者认为，一本普通编辑学的书中不可能一一研究各类图书的编辑活动，但选择若干种重要门类的图书来研究它们编辑工作的特殊要求和规律还是必要的。这一指导思想在《实用编辑学》中得到了体现。到 1995 年 该书印了五次 可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该书基本上是数十年来我国编辑工作的实践总结，理论性还不够强。

刘光裕、王华良的《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年)是两位作者的学术论文集。该书对编辑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几乎都有涉及并成一家之言。例如，关于编辑的概念、编辑的社会本质、编辑的社会作用、编辑的社会价值、编辑劳动的创造性、编辑主体和客体、编辑与传播、编辑的起源、编辑活动的特征以及编辑学的对象、范围和体系等 作者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编辑学研究的开启性作用是显见的。该书已经孕育了编辑活动源于出版的观点，是后来被称为“出版编辑学派”的发轫之作。

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是探讨编辑学普遍原理的开山之作。该书越出了以往编辑规律探讨者往往着眼于编辑业务、编辑工艺、编辑过程、编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等考虑问题的范围，从社会文化的缔造构成规律和信息智能化规律来审视编辑规律和原理。该书广阔的研究视野对编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启示，是

后来被称为编辑学理论的一大流派——文化建构编辑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任定华、曹振中、周光达主编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是研究科技期刊编辑学的第一本专著。该书着力运用“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成果阐释科技期刊编辑活动,提出了有新意的编辑学的框架结构——总论、原理、方法论、编辑工程。对编辑、编辑活动、编辑学的基本概念做出了新的界说,其意义不限于科技期刊编辑学的研究。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的另一个并没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贡献是,它昭示了科学技术类出版物编辑活动与社会科学类出版物编辑活动的区别。实际上最早揭示这种区别的当是司锡明的“信息智化编辑观”,^[9]《导论》的贡献是进一步地提出了科技编辑活动的“信息原理”、“传播原理”、“系统原理”等。

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有许多被直接用作培训编辑人员和高等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教材。例如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张玫、林克勤合著的《书籍编辑学简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年)、王耀先主编的《科技编辑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年)、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钱伯诚主编的《图书编辑学概论》(上海新闻出版局职工大学,1991年)、徐柏容、杨钟贤合著的《书籍编辑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

这一时期,老一辈编辑家对编辑工作实践经验和编辑业务知识的总结,为编辑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和丰富的内容。例如罗竹风的《杂家和编辑》、孙犁的《编辑笔记》、韦君宜的《老编辑手记》、杨牧之的《编辑艺术》、赵家璧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以及吴道弘主编的《编辑工作二十讲》、戴文葆等著的《编辑工作基础知识》、金常政等著的《百科全书及其编辑研究》等,都为编辑学的创生发挥了奠基的作用。

4. 编辑史的研究成果以及编辑出版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都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拓荒性的贡献。

这一时期,编辑史的研究成果如《中国书籍编纂史稿》(韩仲民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宋应离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编辑出版专业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辑出版辞典》(陈友政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简明编辑出版词典》(王业康主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孙树松、林人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编辑实用百科全书》(边春光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等,都为编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拓荒性的贡献,都是编辑学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为编辑学的确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不仅使研究初期“编辑无学”的声音偃旗息鼓,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日本、韩国的出版学家多次撰文介绍中国的编辑学研究。1990年8月26日美国的《克里夫兰每日旗帜报》在报道中说:“我想向我的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近

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编辑学。在全世界，一直对编辑出版进行研究，但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严整的学问加以深入研究则很少见。”

三、20 世纪 90 年代——编辑学的发展、深化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是编辑学研究持续发展、进一步深化的时期。编辑学研究持续、深入发展既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要求也是编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这个时期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变革。在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党和国家适时地拨正了方向：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编辑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一方面肩负着传播、积累先进文化，繁荣社会文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任务，另一方面要研究出版物的市场，关注产业的经营和经济效益。这是对中国传统编辑观念的重大冲击，也是编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对编辑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深化改革，繁荣编辑出版等文化传播事业，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开展对编辑实践、编辑理论和编辑学的研究，以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新闻、出版等传媒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是正确舆论导向的把握者、科学理论的传播者、高尚道德的弘扬者、优秀作品的生产者。编辑工作是传播媒介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学是研究传播媒介中编辑工作规律和历史的科学。研究编辑学就是抓了传播媒介工作的中心环节，其目的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等传播事业的规律。编辑出版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基本建设，是百年大计。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编辑学研究虽已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多数还是侧重于对编辑实务、编辑过程、编辑经验的描述与总结，而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编辑活动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对编辑活动的本质、特性等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透彻地研究，从而使编辑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概念系统、学科体系及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问题的研究，还没出现权威的理论体系。例如对编辑学的核心概念“编辑”的诠释，还基本上处于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阶段。

实践上和理论建设上的需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编辑学研究持续、深入开展的主要动力。

这个时期的编辑学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有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形成了编辑学研究的骨干队伍，营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和研究局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理论创新成果。

（一）中国编辑学会对编辑学研究的规划引导和组织攻坚作用

1992 年，全国性编辑学术组织——中国编辑学会成立。从此，编辑学研究有了统一谋划和便于研究者之间联络沟通的组织。中国编辑学会以“组织书刊编辑的理论和学术研究工作”为己任，通过制定研究计划，举行学术讨论会、报告会，组织编写、出版编辑理论、编辑业务、编辑史及编辑管理方面的著作等形式，突出地发挥了规划引导和组织攻坚的作用，极

大地推动了编辑学研究。例如 对于由《编辑学刊》自 1990 年至 1997 年组织开展的关于“编辑”概念的大讨论 中国编辑学会 以下简称学会 自始至终都给予了重视、支持、协调和帮助,使这场大讨论成为编辑学研究中的一场学术攻坚战,有力地推动了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1994 年,通过在郑州举行的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学会将编辑学的研究重点确定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出版编辑活动的研究,尤其要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95 年,学会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编辑学研讨会的主题是研究编辑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刘果会长在致全体与会者的信中明确提出:编辑学属于应用学科 编辑学研究要面向现实 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实际情况 从研究图书编辑学入手,以此为突破口,可形成揭示编辑活动一般规律的普通编辑学。刘果会长的观点对于认识编辑学的学科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 1996 年始,学会一直积极推动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1997 年在银川召开的全国编辑学研讨会,把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确定为学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组织出版界和教育界的有关专家学者进行重点攻关。对编辑学研究的重点攻关 刘果会长指出:“在别的很多领域都有组织强大力量对重点科研课题进行攻关的经验。编辑学研究能不能组织这种攻关呢?组织攻关或者吸引更多的人把研究的注意力相对集中到重点科研课题上来,这是有可能的。需要比较准确地提出重点科研课题,又进一步要求对整个编辑学研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要求现在拿出成熟的编辑学来 确实还做不到。但是 争取现在拿出一个编辑学理论框架来 好像还是有可能的。这个理论框架应当是迄今为止编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提纲挈领的归纳。”^[11]

在这场攻坚战中,相继出现了关于理论框架的几种方案,并在湖北省编辑学会主办的《出版科学》上陆续发表。在关于建立编辑学理论框架的讨论中 林穗芳在《撰写和完善 编辑学理论纲要 需要探讨的一些问题》、^[12] 逸士在《从电子出版物的编辑活动想起》中^[13] 都发表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作为学会副会长的阙道隆先生则一直在密切关注全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进展 他身体力行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 对编辑学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进行了潜心研究。1998 年初 他发表了论文《建立和完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14] 提出了十二个编辑学理论研究课题;此后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又撰写出《〈编辑学理论纲要 构想〉一文》;^[15] 2000 年,阙道隆在认真研究各种讨论意见和文献资料之后,撰写出了《编辑学理论纲要》。^[16] 林穗芳认为:“《编辑学理论纲要》的发表反映了我国编辑学研究二十年来的长足进步,并在研究的核心领域填补了空缺,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7] 尽管《编辑学理论纲要》还仅仅是一部六万字的“纲要” 还难说是完整的成体系的理论 对编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涵盖进去 但是 它的重要贡献是理清了研究思路 为编辑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基础。可以说,这是学会组织学术攻坚活动结出的一个硕果。

中国编辑学会对编辑学研究的组织、引导作用 还体现在年刊《中国编辑研究》的编辑出版上。自 1996 年以来,学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编辑班子,除少量文章是根据需要组织作者撰写的外,主要是对上一年全国各编辑出版专业刊物发表的编辑研究文章进

行选萃汇编。具有年鉴性质的《中国编辑研究》的编辑出版受到了编辑出版界的热烈欢迎，认为它博采精收，是历年编辑理论研究成果的缩影，具有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沟通研究信息、汇集研究资料、积累研究成果的作用。通过总结交流和沉淀积累，《中国编辑研究》的出版必将有力地促进编辑学学科基础渐趋深厚，学科体系日渐完备。

（二 编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1. 编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是工作在编辑出版战线的资深编辑。

编辑学属应用学科，编辑的学问产生于编辑实践。这个特点决定了研究编辑学的中坚力量是工作在编辑出版战线上的资深编辑。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研究兴起，是他们率先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编辑经验，有的可说是毕生的积累，经过理性思考和理论升华奉献了出来。进入90年代，一些老编辑家已进入退休年龄，但他们对研究编辑学的执著和热情，对编辑学学科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却有增无减。其代表人物如戴文葆、邵益文、林穗芳、阙道隆、吴道弘等，迄今仍一如既往地将继续编辑学的发展与确立视为己任，孜孜矻矻，辛勤笔耕，继续跋涉在编辑学研究的崎岖山路上。

2. 编辑学研究的另一支生力军是高等学校新闻编辑出版专业的教研力量。

我国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与编辑学研究是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编辑学专业首批招生。此后，清华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相继开办编辑学专业。新闻传播学开展高等教育的历史要长些，但对新闻传播媒介编辑活动的研究也是在对出版编辑活动开展研究时才开始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办学初期，没有现成的教材和成型的课程体系，编辑学专业课教师也大多是“奉命”转行来做的。教学的需要促使编辑学专业的教学人员首先走出去，深入到编辑出版工作第一线调查访问；再是请进来，让编辑出版专家登台为学生授课。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办学实践，到90年代中期，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不仅将一批批学有专长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输送到了书籍、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的编辑工作岗位，而且将一部部编辑学研究的专著奉献于社会。例如，武汉大学向新阳著的《编辑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上海大学尤红斌著的《编辑学概论》（百家出版社，1995年）、清华大学庞家驹主编的《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司和有著的《科技编辑学通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河南大学王振铎、赵运通、洛阳师专著的《编辑学原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南开大学赵航著的《选题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高等学校创办编辑出版学专业实践的产物。为了教育和教学的需要，教学人员不得不去思考、探讨、回答编辑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而郑兴东主编的《报纸编辑学教程·新闻事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胡武著的《现代新闻编辑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蔡雯著的《现代新闻编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吴飞著的《新闻编辑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潘树广著的《编辑学》（苏州大学出版

社,1997年)等,则是作者将新闻媒介编辑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取得的成果。所有这些专著既是培养各类传播媒介编辑人才的教材,又是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

3. 编辑学研究还有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高校学报的编辑从业者。

中国大学学报是随着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近现代报刊的出现在19世纪末产生的。经过百年的发展至20世纪末已有近两千种,每年发表的各学科门类研究论文二十余万篇,成为中国期刊出版界的一支特别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研究兴起,学报编辑从业者即是积极响应者和踊跃参加者。据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所编的《编辑学论著题录》统计自1980年至1998年,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编辑工作者所公开发表和正式出版的编辑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就达2539项,而未统计在内的理工科学报编辑人员的研究成果估计也不会太小于这个数,其总量确实十分可观。在上世纪编辑学产生、发展的二十年中,在编辑学核心期刊上常有高校学报编辑工作者颇具创见的论著见刊。这些成果,其理论思维遍及编辑学包括编辑史的方方面面,其理论取向不断深入,渐成体系。更具代表性的是他们创立了编辑学的独立门类——学报编辑学。学报编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几乎全部都是从研究者的编辑实践中产生,又被运用来指导编辑实践,从而极大地推动着高校学报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地向高质量、高层次迅速发展。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今日中国高校学报的整体质量与20世纪80年代前相比已呈现出崭新的风貌,这当中绝对不应抹杀学报编辑学研究的那份功劳。作为理论成果,卜庆华主编的《学报编辑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任定华、曹振中、周光达主编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奚尧生、孙秋生、丛林主编的《学术期刊编辑学研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年)雷起荃主编的《学术编辑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钱文霖主编的《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及其姊妹篇《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晓燕、马国柱主编的《学报编辑与编辑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温绍堃主编的《学报编辑学引论》(地震出版社,1998年)孙景峰著的《学报编辑工程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以及宋应离著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姚远著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当属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高校学报编辑从业者中,虽不是人人都研究编辑学,但倾心专注于治编辑之学的确实大有人在。例如,河南大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学报编辑部为依托成立了编辑学研究室,其人员既是学报编辑又是编辑学研究者,同时还是编辑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和教学工作者,他们是把编辑活动实践与编辑理论研究、编辑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典范。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从这个学术群体中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编辑出版学研究者 and 中青年编辑学研究者如王振铎、宋应离、张如法和靳青万、阎现章、李明山、李频等。他们奉献给社会的理论成果也是丰硕的如王振铎等的《编辑学通论》、《编辑学原理》宋应离的《中国大学学报研究》、《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张如法的《编辑社会学》、《编辑的选择与组

构》 靳青万的《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 阎现章的《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 李明山的《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 李频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期刊策划导论》 张晓菲的《影视编辑学》等。再例如，华中理工大学以学报主编钱文霖为带头人，以学术沙龙的形式聚集了一批有志于编辑学研究的高校编辑出版工作者，这当中有许多才华横溢的青年编辑工作者。他们研究的课题是科学技术编辑活动中的难点：科技编辑人员如何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具有一定学术层次的科学技术文稿的内容做出取舍的判断和选择，审查出其中的疏误并使其得以修正。他们认为，研究和掌握科技编辑的方法，十分有助于上述难点的解决。他们结合自己的编辑实践，开展了艰苦的理论思维和探索，其心血与汗水最终凝结在《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论》、《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等著述中奉献给了社会 钱文霖同样也把他的研究成果融进了对科技编辑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之中。

4. 高校研究著述的力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综观高等学校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其突出特点是实现了编辑学专业教育、教学与编辑学研究密切结合，编辑实践与编辑理论研究密切结合，老中青研究者密切结合。这三个结合是使编辑学研究持续向前推进、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正确道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国编辑学会就对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给予了关注。1996 年 邵益文先生的《编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 在对 1995 年底以前出版的编辑学著作进行了统计之后得出结论说：“高校研究著述的力量，如果和出版界相比，基本上已经是一半对一半。”“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过去在编辑学研究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后还将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且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支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将会加快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进程；没有他们，编辑学学科的建成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和研究局面

说 20 世纪 90 年代的编辑学研究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和研究局面。

在这时期，编辑学研究的持续开展，激励、吸引了各种传播媒介的编辑从业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从涉及的面上来看，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性。编辑出版是多学科多层次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它的产品——出版物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各个知识门类 and 各个文化层次。这就决定了具体的编辑活动呈现多样性。研究者们最先都是从自己所从事的编辑活动的个性出发来体察编辑学研究的内涵的。不同媒介具体编辑活动的个性差异，使研究者们对编辑的丰富内涵的观照，不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都出现了差异。例如：①关于编辑概念。究竟什么是“编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研究者们有的对“编辑”词义的起源与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有的将国内外若干工具书中对“编辑”的释义进行了全面搜集、研究和对比；更多的研究者则是从古今社会存在的编辑现象、编辑活动及自身的编辑工作实践出发，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编辑”涵义进行了认识和体察。据统计，研究者们对编辑概念的界定达数十种之多。为了探讨这个编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问题，《编辑学

刊》于1990年11月至1997年12月,组织开展了历时七年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共发表争鸣文章二十余万言,涉及的作者分布于全国十一个省、市的高校、出版社及其他编辑出版和科研单位。^[7]关于编辑活动的历史起点。出现了“有传播就有编辑活动发生”、“有文字记载的档案文献资料就有了编辑活动”、“有书才有编辑活动”、“有出版业才有编辑活动”等几种观点。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有“编辑过程”、“原稿”、“编辑关系”、“主体客体”、“编辑规律”等几种观点。关于编辑学的研究范围。有的认为“编辑学研究的是出版业、传媒业中的专业编辑活动,出版业产生之前的‘编纂’、‘编次’、‘编修’、‘编撰’等活动属于著述活动,不是编辑学研究对象;把出版业之外的所谓编辑归入编辑学研究对象,是对‘编辑’的泛化。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编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编辑活动,包括作为出版业的一部分的编辑活动、出版业形成之前的编辑活动和出版业之外的编辑活动。关于编辑学的学科性质。出现了“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横断学科”等几种观点。

对编辑学研究中出现的那种局面,有批评者认为是“散”、“乱”、“浅”,面上看似百家争鸣,骨子里是各持己见,各不相让,缺少联合、兼容并蓄的气度”。尤其是那些“最多只能算一般的编辑研究”的,“万不可动不动或时不时就打出王旗‘编辑学’”,“抢先赶早贴的和强行硬贴的‘编辑学’标签,各个貌合神离,让受众茫然”。^[18]对编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上述局面如此评价,尽管难免偏颇,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依笔者浅见,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似不够开阔,如此,往往容易偏执于一隅之见。因此,对编辑学的研究,不仅应有知难而上、积极探索的精神,还应有科学的方法。

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需要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我们应该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辛勤劳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形成一种鼓励探索与创造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19]上述原则,同样适用于编辑学研究。编辑学是一门只有二十年发展历史,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新兴学科,在它的创立、建设时期,亟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对编辑学研究开展批评也是一种建设。笔者认为,编辑学研究出现的多种学术观点辩论、争鸣的局面是十分可喜可贵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全国的大气候和编辑学界的小气候都有关。同其他学科一样,编辑学也只能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成长、成熟。研究者的见解不管是“公理”还是“婆理”,不论是“见仁”还是“见智”,都可能给人以新的启迪,都可能引发研究者智力上的碰撞和创新思维火花的闪现。不仅现在需要,即使学科发展成熟了,仍然需要学术上的讨论和争鸣。在讨论和争鸣中,权威的编辑学理论体系将应运而生。

(四) 研究的广泛性和成果的创新性

1. 20世纪90年代,编辑学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 到 2000 年底,已出版的编辑学著作作为二百余种,其中书名标有“编辑学”字样的八十余种;最后几年发表的论文有上千篇。^[20]在这二百余种编辑学专著中,约有一百五十种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的。

2. 以书、刊、报编辑学为核心的出版编辑学的研究为普通编辑学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说 20 世纪 90 年代是编辑学研究持续发展、进一步深化的时期,一个重要表现是书籍、期刊、报纸三大传统出版传播媒介的编辑活动继续被当成了研究重点。这期间,研究者们把书、刊、报编辑活动中应该研究、值得研究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初步翻挖一遍,主要的研究课题大多已经提出,面积较大的空白点似乎所剩不多,研究有了明显的深化。20 世纪 80 年代的著述基本属拓荒之作,大多是实践的总结、经验的描述、技艺的传授。而 90 年代的著述有的是对 80 年代的著述进行了修订或增补 例如高斯等的《图书编辑学概论 增订本》(1995 年)刘光裕等的《编辑学理论研究》(1995 年,在 1989 年出版的《编辑学论稿》的基础上增补而成)郑兴东等的《报纸编辑学 修订本》(1992 年)等;有的是将 80 年代的研究深化之后重新写作的,例如阙道隆等的从《实用编辑学》(1982 年)到《书籍编辑学概论》(1995 年)徐柏容的从《杂志编辑学》(1991 年)到《期刊编辑学概论》(1995 年)胡传焯的从《科技期刊编辑学》(1990 年)到《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学》(2000 年)任定华的从《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1991 年)到《编辑学导论》(2001 年);有的则是借鉴以往的研究经验,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在研究深度和成果积累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例如庞家驹主编的《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1996 年)司有和著的《科技编辑学通论》(1996 年)而钱文霖主编的《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1998 年)虽是《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论》(1992 年)的姊妹篇 却是更具有应用性、理论性和体系结构的新的研究成果。

书、刊、报三大传播媒介编辑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其他文化传播媒介编辑学的研究。进入 90 年代以后,几乎各种文化传播媒介的编辑活动都纳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出现了《广播编辑学》(王瑞棠主编 新华出版社,1992 年)《影视编辑学》(张晓菲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电子新闻媒介栏目编辑学》(刘志筠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摄影图片编辑学》(康大荃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7 年)等专门传播媒介编辑学以及《文艺编辑学》(陈景春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年)《学术期刊编辑学研究》(奚尧生、孙秋生、丛林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 年)《现代新闻编辑学》(蔡雯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新闻编辑学》(吴飞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年)《科技编辑学通论》(司有和著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年)《新闻编辑学研究》(钟立群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等专业编辑学论著。

以书、刊、报编辑学为核心的出版编辑学的研究成果为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基石。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编辑学会一直在积极推动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研究。这期间,以书籍编辑学为核心的出版编辑学的研究者们成为这一构想的身体力行者,

他们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基础。阙道隆、林穗芳、徐柏容合著的《书籍编辑学概论》从总结书籍编辑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详细地研究书籍编辑工作的多种实践及其方式方法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书籍编辑学研究的是“书籍编辑活动的性质、特征和社会功能,书籍编辑活动与社会的联系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书籍编辑活动的实践过程及其原理和方法,以及书籍编辑活动的组织管理和队伍建设等问题”从而明确了书籍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籍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因而“书籍编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应该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具体论证了书籍编辑学产生于编辑实践,是实践经验的理论表现,因而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属于应用科学的范畴。《书籍编辑学概论》为书籍编辑学初步立起的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在书籍编辑学研究对象、学科定性与定位等问题上的理论创新,都成为研究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铺垫。此后,阙道隆在他80年代主编我国第一部书籍编辑学《实用编辑学》、90年代与人合著《书籍编辑学概论》及十几年对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又将我国二十年来的编辑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全面的概括和升华,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表了《编辑学理论纲要》(简称《纲要》),《纲要》既融进了二十年来我国编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又有许多提高和创新;它所构建的编辑学理论框架初步奠定了编辑学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林穗芳先生认为:“大从理论框架构建、学科定位起,小至一般名词概念的阐释和编辑学用语的规范化”,《纲要》“在多方面为今后的编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基础”。^[17]

3.《辞海》对“编辑”的释义及修改。

20世纪90年代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深化还体现在权威工具书《辞海》对“编辑”一词释义的修改上。《辞海》1979年版对“编辑”一词的释义是:“指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环节。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1989年版把释文的第一义项修改为:“新闻出版和电影等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或摄制前的重要环节。”1999年版对这一义项的释文又进行了如下修改:“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的工作,是传播媒介工作的中心环节。”对“编辑”一词释义的几次修改,反映了开展编辑学研究的二十年中,人们对编辑涵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一是将编辑概念的外延,即编辑活动的范畴,从“新闻出版”扩大到“新闻出版和电影等”,再扩大到“传播媒介”;二是对编辑活动性质、作用的认识,从“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环节”到“定稿付印(或摄制)前的重要环节”,再到“传播媒介工作的中心环节”。对编辑活动范畴和性质、作用认识的深化,有利于对编辑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推动了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20世纪编辑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历程,大致经历了倡导发动、酝酿创生、持续发展等几个阶段。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从研究编辑现象、编辑历史、编辑业务、编辑经验入手,逐渐走向了研究编辑本质、编辑规律和编辑学的概念系统、理论体系,从分类研究开始,先后形成了书籍编辑学、期刊编辑学、报纸编辑学、广播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等分支学科。从上个

纪末开始，研究者们开始探讨不同传播媒介编辑活动的共性问题，试图建立能涵盖古今中外编辑活动和多种传播媒介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这也预示了编辑学研究在新的世纪的发展趋势。

四、编辑学缘何诞生于中国

编辑学诞生于中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

1. 中国传统的书文化与出版印刷文化是编辑学的深厚土壤。

如果从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的书契档案和甲骨卜辞文献 以及其后两千多年中编纂出来的经、史、子、集等浩瀚的文献典籍来审视中国传统的书文化和出版印刷文化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编辑”作为一种现象 抑或作为一种方法、技术、手段 抑或作为一项社会文化活动 均渊源于古代文献和图书的编纂、集辑、收藏与校勘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 积淀了重教化、重学术、重校勘、精编精印的编辑思想和编辑传统 创造了丰富的编辑体例和编辑方法。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研究中国的图书出版印刷文化时认为：中国是文字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 而且一脉相承 从未中断 中国是出版印刷业最先发达最早普及的国家 中国是文献载体材料众多 最先发明造纸术的国家 中国是最先发明印刷术 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三种技术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典籍最多 图书类型最丰富的国家 中国书籍讲究装帧设计，很早就有了成形的书籍制度并不断发展演变；中国古代公私刻书藏书在图书保护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图书编纂机构和出版管理制度，编纂了许多部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巨帙大书；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图书发行的历史，很早就出现了书业广告、稿酬、版权意识 中国的版本、辨伪、辑佚、校勘、目录等治书之学发达 硕果累累，这几门学问都是围绕图书的出版印刷活动展开的。^[21]美国学者钱存训博士对中国的书文化则评价说：“在世界文明史中 中国文字记录的多产、连续和普遍性最为突出。中国典籍数量的庞大、时间的久远、传播的广泛和记录的详细 在 15 世纪结束以前 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22]在积淀如此深厚的中国传统图书出版印刷文化中孕育出“编辑学”这门专业和学问来，是毫不奇怪的。

2. 二百年来近现代报刊的出版传播文化是编辑学的滥觞。

在古代社会，人类知识与文明的积累、传播主要靠图书。图书是传统文化与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在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进入近代社会，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新的传播媒体——现代报、刊首先在西方社会应运而生。机械印刷大大提高了出版生产力 在报、刊编辑出版机构中首先出现了编辑与印刷、销售的专业化、职业化分工 随后在现代书籍出版机构中也出现了专职编辑人员。至此，编辑活动有了常设机构和职业化分工，并开始全面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一过程的实现，西方始于 16 世纪 至 19 世纪初叶完成 中国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至 20 世纪初叶完成。中国现代报刊的产生有两大源流：一是在中国